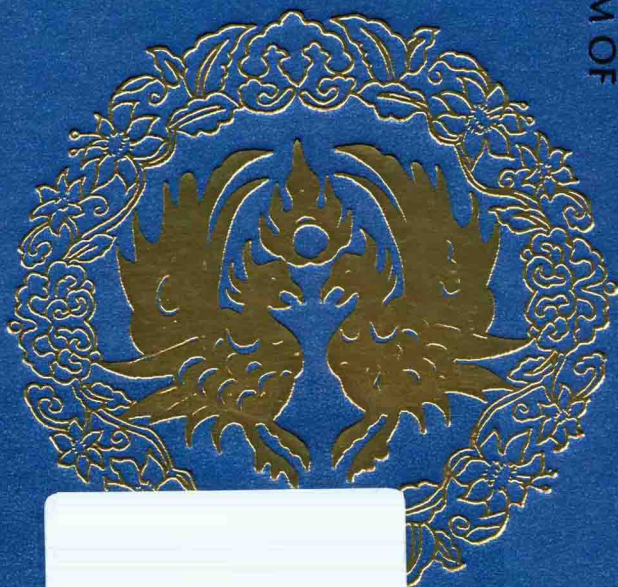


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

RESEARCH ON THE FUNERAL SYSTEM OF
NOBILITY IN THE LIAO DYNASTY

内蒙古博物院 编 / 郑承燕 著



文物出版社

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

RESEARCH ON THE FUNERAL SYSTEM OF
NOBILITY IN THE LIAO DYNASTY

内蒙古博物院 编 / 郑承燕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智 朴 李 颀

封面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陈 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 / 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8

ISBN 978 - 7 - 5010 - 4004 - 9

I. ①辽… II. ①内… ②郑… III. ①贵族—葬俗—研究—中国—辽代 IV. ①K89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8732 号



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

内蒙古博物院 编 郑承燕 著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网 址 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 1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004 - 9

定 价 180.00 元

摘 要

辽朝是由契丹族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大体与中原五代与北宋时期相当，并长期与北宋政权并立。随着契丹与汉人的接触日益密切，尤其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出台后，辽朝便开始了二元政治体制建设。辽代丧葬制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兼具多样化与民族化的双重特点，是我国古代传统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丧葬制度理应包括“丧”和“葬”两部分，而目前的学术研究，对于辽代墓葬制度（“葬”）的研究与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丧葬礼俗（“丧”），辽代丧葬制度研究的系统性与全面性有所欠缺。基于此种状况，本书将辽代贵族丧葬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墓志、碑刻等石刻资料为主要突破口，运用考古学与文献学互证的二重考据法，结合民俗学、堪輿理论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对辽代贵族丧葬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提炼，进而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希望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有益补充。

通过系统梳理辽代帝陵发现过程与研究现状，本书以目前研究与考古工作较为充分的祖陵和庆陵为中心，总结与归纳了辽代陵寝制度的特征与特点，认为辽代陵寝制度在因袭唐陵旧制，借鉴宋陵卜选中的堪輿因素之外，还多有创新，开启了中国古代单一兆域、多座帝陵的先河，具有健全、完备的皇陵管理机构，对其后的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产生过积极影响，并成为明代“陵山之祭”的滥觞，为丰富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墓葬制度研究方面，作者以长城为界，将发现于内蒙古、辽宁、北京、山西和河北等地的辽代墓葬分为南北两区，并结合墓主人的族属，将辽代贵

族墓葬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七段，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壁饰和葬具四个方面，论述了辽代墓葬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轨迹，并对贵族墓葬制度中的创新因素进行了讨论。

基于史料和石刻资料中对于辽代丧葬礼俗的记载，认为契丹族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尤其是政权建立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丧葬礼俗日趋完备，同时也能兼顾本民族的传统礼俗，这是多元文化整合的结果。书中还对辽代贵族丧葬制度中的民族融合因素，及其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关键词：辽代 墓葬制度 丧葬礼俗 民族融合

ABSTRACT

The Liao Dynasty, a northern minority regime established by the Khitan in China's ancient time, enjoys the same time span of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coexists with the Song regime in central – plains in a long term.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close contact between the Han people and Khitan, especially after the policy of “ruling Khitan by the national system, treating Han in Chinese way”, the Liao regime began to conduct a central – plains – oriented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its stro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features, the funeral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enjoys the doubl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ustom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The funeral system should include two parts, that is, the mortuary practices and burial system. Currently, most researchers focus on burial system instead of mortuary practices, letting alone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aking these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selects the funeral system of nobility in the Liao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oping to become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of the funeral system. One of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this thesis is that the author

takes epitaphs and inscriptions excavated from Liao tombs as main and basic research material. Using double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folklore, geomancy the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noble funeral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comprehensively, trying to draw a relatively scientific conclusion as a result.

Basing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iscovery process and current research on Zuling Mausoleum, Huailing Mausoleum and Qingling Mausoleum among the five Mausoleums of the Liao Dynast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ausoleum system of Liao follows some custom of the Tang Dynasty, learns from that of Song Dynasty and creates some new factors which greatly contributing to the abundance of the mausoleum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As far as the study of burial system is concerned, taking the Great Wall as a boundary, the author divides the tombs of Liao Dynasty found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Liaoning, Beijing, Shanxi and Hebei Provinces into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stricts. Taking different nationality – belongings of the occupant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divides the tombs of Liao Dynasty into early, middle and late phases and seven sections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burial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from four aspects, that is, shapes of tombs, burial wares, wall ornamentation and tomb furnitures, with the innovation factors being discussed.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historical data and characters on carved stone about the mortuary practices of the Liao Dynasty,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Khitan nationali-

ty, especially after the found of the regime, the mortuary practices not only increasing complete itself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uneral custom of Han culture, but consolidate its traditional custom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multiple cultural integration,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the Khitan mortuary practices. The author also fully discusses the fusion factors in the noble funeral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and its function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burial system mortuary practices
national fusion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1
第二章 辽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	17
第一节 辽代帝陵与奉陵邑	18
第二节 辽代陵寝制度研究	38
第三章 辽代贵族墓葬制度研究	67
第一节 辽代贵族墓葬的考古发现	67
第二节 墓葬制度研究	98
第三节 辽代贵族墓葬制度的创新因素	110
第四章 辽代丧葬礼俗	123
第一节 辽代建立前后契丹人的葬俗与墓葬遗迹	125
第二节 辽代帝后丧葬礼俗	128
第三节 辽代贵族丧葬礼俗	162
第五章 辽对唐宋丧葬制度的仿效、吸纳与发展	185
第一节 辽代陵墓所体现的阴阳堪輿因素	185
第二节 辽代丧葬礼俗中的民族融合因素分析	191
第六章 结语	221
参考文献	227
图版	253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一 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由“丧”和“葬”两部分组成，是丧葬礼俗和墓葬制度的集合体。

“丧，亡也，从哭亡”^①，指哀悼死者的礼仪。人死之后，其家人及亲朋要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和悼念，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以殉葬的方式来表示。随着丧事活动的发展，自然形成一整套明确的制度，即所谓的丧葬礼俗。

丧葬礼俗还可分为丧礼制度和丧服制度^②。《荀子·礼论》中即言：“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死者也。故事死如生，视亡如存，终始一也”。丧礼是指哀悼死者的礼仪，是与殓殓死者、举办丧事、居丧祭奠有关的种种仪式礼节，在古代被视为凶礼之一。在以《仪礼》为主要依据的中国古代社会，丧礼制度有着等级分明的特点：身份尊卑不同，对死的说法

①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②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不同,“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①;丧礼也有不同的等级,程序复杂,名目繁多,可谓繁文缛节。丧服制度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俗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重要社会制度之一。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谓“古礼最重丧服”^②就充分反映了丧服制度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性。丧服制度的实质就是“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③,也就是根据血缘关系和服丧的期限,形成的一套严整而系统的以着丧服为主的五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礼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④,指处置死者遗体的方式。人死之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需要对尸体进行相应的处理与修饰,不同时代埋葬或处理死者的方式、方法亦不同。这些葬式、葬具和随葬品的差异与变化均是墓葬制度研究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风俗习惯、礼仪制度、思想意识与经济形态,可以视为当时社会的缩影。

由是观之,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包括埋葬制度和居丧制度,其中居丧制度还可分为丧礼制度和丧服制度,可以理解为包括地上的丧葬礼仪和地下的墓葬制度两个方面。丧葬礼俗和墓葬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使得中国二元背立的丧葬观念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得以统一,形成地上地下截然不同的丧葬文化,构成了丧葬制度研究的主体与主要内容。

辽朝是一个由契丹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经太祖耶律阿保机“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疆域“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

①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5页。

②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9页。

③ 《仪礼·丧服》中贾疏引(汉)郑玄:《三礼目录》,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52页。

④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7页。

里”^①，曾一度占据以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主要包括外兴安岭以南的东北地区、山西大同地区、河北北部地区和现今蒙古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图版一）。“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称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计九主，在位首末二百一十五年，实历二百丹九年”^②。辽王朝从建国到灭亡，时间大体与中原的五代和北宋时期相当，并长期与北宋并立，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北方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契丹族从兴起到消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由于史料的单薄与缺失，以至部分记载语焉不详甚至错误，对于辽代丧葬制度的研究或仅停留于墓葬制度分析层面，或是墓葬制度与丧葬礼俗研究脱节，不仅有碍于科学结论的得出，而且不利于跨学科、深层次的系统研究。因而，要更接近真实的辽代社会，复原辽代丧葬制度的全貌，单纯从史料记载入手难免有失偏颇，会产生不全面甚至相背离的结果。

所幸的是，随着辽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形制各异、序列完整、时空框架完善的辽代墓葬被大量发现。这些墓葬中死者的葬式、葬具、随葬品以及石刻资料的记载，为系统研究辽代墓葬制度提供了直观的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深刻阐述辽代社会的丧葬礼俗弥足珍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开启了对辽代丧葬制度研究的新篇章。本书即是选取辽代丧葬制度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二 选题意义

以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神甫闵宣化（Joseph Mullie，旧称牟里，下同）对辽庆陵的调查，传教士凯文（R. P. L. Kervyn，汉名梅岭蕊，下同）对庆陵中陵进行发掘并发现兴宗及其皇后的哀册为肇端，目前已经发现的辽代墓葬已

① （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24 页。

②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契丹国九主年谱》。

逾千座，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北京、河北和山西北部等地。这些墓葬族属以契丹、汉族为主体，墓葬规模不一，形制多样，类型各异，等级有别，多数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部分墓葬出土有墓志并有精美壁画，对研究丧葬制度有着典型的代表意义。

随着辽墓出土资料的日渐丰富，通过对已发表的辽墓考古发掘报告、简报及专著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出辽代丧葬制度的一般性规律已经成为可能。学术界对辽墓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上，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对推动辽代墓葬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就其系统性与全面性而言，则稍有欠缺。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本书选取已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辽代贵族墓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区分契丹墓和汉人墓的基础上，契丹墓以帝后陵、契丹大贵族墓葬为研究重点，重点选取诸王、公主、国舅、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的墓葬为研究对象，汉族人墓葬则主要选取汉族世家大族墓葬为例证。本书中的讨论，重点立足于现有发掘资料与墓葬出土情况，同时结合史料加以甄别，通过归纳总结，分析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墓葬的特点，探讨辽代丧葬制度的特征，以期对整个辽代社会背景进行研究。这是本书选题的意义之一。

长城地带，特别是长城以北地区，是辽代契丹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契丹族的龙兴之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地区发现了包括辽代皇陵及显要贵族墓在内的一大批重要墓葬。这些墓葬的考古材料丰富、年代序列明确，墓葬形制、规格、随葬品数量与精美程度，均胜于长城以南地区。在对现有墓葬进行合理分区的基础上，探讨辽代丧葬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分析长城南北丧葬礼俗与墓葬制度差异产生的根源，而非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这是本书选题的意义之二。

辽墓所反映的丧葬习俗具有多样性。由契丹人建立起来的辽代政权境内，除契丹和汉两大主体民族以外，还生活着渤海、奚、回鹘等其他

少数民族^①。不同族属、不同身份墓主人的生死观，对于墓葬制度诸要素的要求有所差别，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契丹人的墓葬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同为居于契丹腹地的汉族世家大族丧葬习俗亦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韩知古家族的民族同化程度较深，韩氏家族到第三代就已完成了血统上的契丹化^②，韩匡嗣夫妇墓（985年）中随葬的两具石契丹侍俑以及墓室壁画内容等，更多地体现契丹人的生活与丧葬习俗^③，而刘祐家族1号墓中（太平六年，即公元1026年左右下葬），虽然墓葬壁画也有契丹人形象出现，但其家族墓地的排序方式严格地遵守着“昭穆葬图”的尊穴，昭穴和穆穴的三个不同辈分墓穴的排序，固守着幽燕汉人的“昭穆”葬俗^④。

因而，就辽代丧葬制度研究而言，除参考墓形墓制、墓内壁饰和随葬品等因素外，也应考察时间、空间因素，以便更加合理、科学地分类。如果不对墓主人的族属、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充分的讨论，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站不稳脚跟的。辽文化是以契丹、汉文化为主的区域文化，我们对辽文化的认识仍过于笼统，对于辽代丧葬制度也不能一概而论，这是本书写作的又一出发点与选题意义所在。

① 漆侠先生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入手，精辟地阐述了辽朝的国家体制。《辽史》列传传主计有305人，其中契丹人234人，占全部传主的76.72%；汉人58人，占19%；奚人7人，渤海人4人，分别占2.31%、1.32%；回鹘人、吐谷浑人各1人，各占0.33%。文见《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王玉亭：《从辽代韩知古家族墓志看韩氏家族契丹化的问题》，《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左旗博物馆：《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

④ 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左为昭、右为穆；父曰昭，子曰穆，根据长幼辈份，祖穴在前、子墓在后，按预定的墓位前后左右排列的墓葬方式。报告见《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1期。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研究现状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辽代墓葬的发现与科学发掘,不断促进辽代丧葬制度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考古发掘的初创阶段(1925~1945 年)、资料积累阶段(1946~1972 年)、初步研究阶段(1972~1983 年)和深入研究阶段(1983 年以后)^①。其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辽代墓葬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为辽代丧葬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研究回顾

(一) 辽代墓葬制度研究

目前最早也是最全面论述辽代墓葬制度的文章是李逸友的《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②一文。作者李逸友认为辽代契丹人的丧葬制度,应包括死后报丧、葬前祭奠、葬后祭祀等多种礼仪,但无法从考古资料方面找到证据。而从考古资料考察,只能分为墓制(指土葬尸体时地下和地上营建物的规律)和葬制(指处置尸体方式的规律)两方面。他从墓地、墓形、墓向、墓室壁画、葬仪等方面考察了葬制的特点,并进而认为辽代契丹墓葬制度的形成,是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了唐宋墓葬制度,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篇文章对于辽代丧葬制度中的墓葬制度论述较为全面,但限于考古资料缺乏,对于丧葬礼俗的关注与

^① 董新林:《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46~252 页。

^② 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0~103 页。

论述略显不足，且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补充与印证，其中的许多说法有失全面。

刘未的《辽代契丹墓葬研究》一文通过对契丹贵族墓葬进行分期，探讨了辽代的墓葬制度，并“将辽代契丹丧葬等级制度定型的时间认定在 11 世纪中期”^①，较有见地，对于汉人墓葬则没有涉及。

张鹏在《辽墓壁画研究》中分别选取庆东陵、库伦辽墓和宣化辽墓的壁画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证了辽代皇族、契丹贵族和汉人的墓葬形制，并探讨了辽代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关系^②。

乌力吉的论文《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以内蒙古地区辽代墓壁画为中心》，专节讨论了契丹族墓葬中反映的中原农业民族的葬俗，对辽代表葬习俗中的民族融合情况也有所涉及^③。

（二）辽代表葬礼俗研究

国内较早著文论述辽代表葬制度的是贾洲杰。他在《契丹丧葬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契丹早期及辽代表葬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对于契丹族独特的丧葬风俗也有所论及，但是较为简略^④。

关于辽代表葬礼俗，张国庆在《辽代契丹丧葬文化考述》一文中，对于辽代契丹人死后的葬式选择、墓室建构及陪葬物品的放置、墓室壁画的描绘、尸体的防腐处理等丧葬文化进行了考证与阐述^⑤。

彭善国在《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的考古学观察》中，以考古材料为基

① 刘未：《辽代契丹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② 张鹏：《辽墓壁画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论文，2003 年。

③ 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以内蒙古地区辽代墓壁画为中心》，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论文，2006 年。

④ 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⑤ 张国庆：《辽代契丹丧葬文化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础探讨了契丹人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契丹贵族的丧葬习俗^①，并在《辽庆陵相关问题刍议》一文中论述了中原汉人在墓地选择方面的阴阳堪輿思想对契丹贵族的影响，对于更深层次礼制上的家族墓地“昭穆葬法”，未作深入阐述^②。

陈述^③、贾敬颜^④、宋德金^⑤等人均著文对“烧饭”习俗进行了探讨，马洪路^⑥、吉成章^⑦、杜承武、陆思贤^⑧、木易^⑨、刘冰^⑩、侯峰^⑪、陈永志^⑫、张力、张艳秋^⑬等人对辽代墓葬中出现的金属网络和面具这一特殊葬俗进行了讨论。其中马洪路认为铜丝网络是下嫁萧家的皇室女子用以覆面的特殊葬饰，这种看法偏于主观武断，已被考古资料所推翻，因为男子使用金属网络的情况不在少数。陈永志认为契丹族用金属面具及金属网络覆尸的习俗，是契丹人固有的“死不墓”习俗与中原汉人的“停尸、守灵、重孝”的习

① 彭善国：《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彭善国：《辽庆陵相关问题刍议》，《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③ 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④ 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⑤ 宋德金：《“烧饭”琐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⑥ 马洪路：《契丹葬俗中的铜丝网衣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83年第3期。

⑦ 吉成章：《豪欠营第六号辽墓若干问题的研究》，《文物》1983年第7期。

⑧ 杜承武、陆思贤：《契丹女尸的网络与面具》，《契丹女尸：豪欠营辽墓清理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 木易：《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⑩ 刘冰：《试论辽代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⑪ 侯峰：《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网络等葬俗的分析》，《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509页。

⑫ 陈永志：《黄金面具、铜丝网络与祖州石室》，《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⑬ 张力、张艳秋：《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